

唐刺史考

K242.6
6

唐 刺 史 考

郁贤皓 著

(一)

京畿道 · 关内道 · 陇右道

江苏古籍出版社



B413553

唐刺史考

郁贤皓 著

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95.625 插页 6 字数 2,225,000

1987 年 2 月第 1 版 198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,800 册

ISBN 7-80519-012-7/K·3

统一书号: 11354·108 (全五册)(平)定价: 22.65 元

责任编辑 陆国斌

K242.6
6
2:2

唐 刺 史 考

郁贤皓 著

(二)

都畿道·河南道

BB72 / 01

江苏古籍出版社



B413555

K242.6

6
2.3

唐 刺 史 考

郁贤皓 著

(三)

河东道·河北道·淮南道

江苏古籍出版社



D 413534

K242.6

6
2:4

唐 刺 史 考

郁贤皓 著

(四)

江南东道·江南西道·黔中道

江苏古籍出版社



B413556

K242.6

6
2=5

唐 刺 史 考

郁贤皓 著

(五)

山南东道·山南西道·剑南道
岭南道·开元二十九年前后废置之州郡

江苏古籍出版社



B 413557

K242.6

6
2:1

唐
刺
史
文

許
子
帆
題



序

卞孝萱

(一)

在文史研究中，理论与材料的关系，是人们经常谈到的，我觉得范文澜师有一段话说得最好：“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定理，理论与材料二者缺一不可。”“现在对历史资料确有望洋兴叹之感，资料太多太散太乱，搜集、整理和考证资料，实在是一件十分重大迫切的事情。我们必须特别重视资料工作，才能动员大批人力投入这个工作里去。”“希望今后有很多资料书、工具书陆续出版，这是一种功德无量的工作！”（《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·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》）我在学习唐史时，深深领会到范老这段话的重要意义。举例来说，当我需要了解某一诗人是哪一年中进士时，就得查徐松《登科记考》；当我需要了解某一诗人住在长安、洛阳哪一个坊（里）时，就得查徐松《唐两京城坊考》；当我需要了解某一年的某道节度使（观察使）是谁时，就得看吴廷燮《唐方镇年表》；当我需要了解某一首诗中的“某大”、“某二”的名字时，就得翻岑仲勉《唐人行第录》；等等。此外，劳格等《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》、赵钺等《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》、姚薇元《北朝胡姓考》等，都是经常查阅的重要工具书。这些书给研究工作者带来方便。这些书出

版得愈多，内容愈完备、准确，给研究工作者带来的方便也就愈大。没有工具书，研究工作者为了找一条材料，往往花费几天甚至几个月的时间；有了工具书，就大大节省了研究工作者的时间和精力，并可使工作的精确程度得到提高。

七十年代与郁贤皓兄相识于南京，“一见肺肝尽，坦然无滞疑。”在谈文论史时，我曾对他说过范老这段语重心长的话，他也颇有同感。我说起目前还缺少一部考证唐代各州(郡、府)刺史(太守、尹)的书，做研究工作时感到很大的不便。由于唐朝年代长，州郡多，资料零散，工作量大，做起来费力气，旷日持久，恐怕很少有人肯承担。他说他正在从事此书的编撰。我钦佩不已。此后，每次见面，必谈此书。我是此书的第一个读者，也是最了解此书编撰过程的人。如以此书与《唐方镇年表》比较，担任节度使、观察使者，多是著名的较大的人物，资料收集较易；而担任刺史者，多是不太著名的较小的人物，资料收集较难。现在，一部二百几十万字的《唐刺史考》完成了，并由新成立的江苏古籍出版社作为重点书出版。贤皓兄为唐史园地开垦了一块荒地，《唐刺史考》为工具书领域填补了一个空白，使从事唐代文史研究的人们得到了便利。贤皓兄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。

(二)

读者在使用《唐刺史考》时，应先对唐代州郡情况有个轮廓的了解。例如：

(1) 唐武德元年，改郡为州，长官称刺史。天宝元年(742)，改州为郡，长官称太守。至德二载(757)，又改郡为州，长官复称

刺史。

(2) 从武德到贞观,唐代州郡经历了一个少——多——少的过程。《资治通鉴·唐纪八》:“隋末丧乱,豪傑并起,拥众据地,自相雄长;唐兴,相帅来归,上皇(指唐高祖)为之割置州县以宠禄之,由是州县之数,倍于开皇、大业之间。上(指唐太宗)以民少吏多,思革其弊,(贞观元年)二月,命大加并省。”就是说的这个过程。

但贞观年间并不是一味地并省州县,也新置州县。举例来说,《新唐书·地理志一·关内道》:丰州,“贞观四年以降突厥户置”。同书《地理志五·江南道》:费州,“贞观四年析思州之涪川、扶阳,开南蛮置”。漆州,“贞观十六年开山洞置”。同书《地理志七上·岭南道》:瀼州,“贞观十二年,清平公李弘节开夷獠置”。笼州,“贞观十二年,李弘节招慰生蛮置”。环州,“贞观十二年,李弘节开拓生蛮置”。古州,“贞观十二年,李弘节开夷獠置”。这都是唐太宗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而新置的州郡。其他皇帝也有这种措施。

贞观以后,随着经济的发展,人口的增多,唐王朝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,又不断地析置州县。这种情况在南方尤为明显。据《新唐书·地理志七上·岭南道》:郁州,“麟德二年,析贵州之石南、兴德、郁平置”。东峨州,“乾封三年,将军王杲奏析白、辩、襄、容四州置”。同书《地理志五·江南道》:温州,“高宗上元元年析括州之永嘉、安固置”。皆是例证。据《唐大诏令集》所载武后《改元光宅诏》:“隆平日久,户口滋多,物务既烦,欺隐斯众。其上州三万户已上,大县万户已上,各宜析出,别置州县。”可见武后改唐为周以后,在全国范围内,有过一次较大规模析置州县的举动。据《新唐书·地理志五·江南道》:衢州,“垂拱二年析婺州之信安、龙丘、常山复置”。漳州,“垂拱二年析福州西南境置”。锦州,“垂拱二

年以辰州麻阳县地及开山洞置”。同书《地理志六·剑南道》：彭州、蜀州、汉州皆“垂拱二年析益州置”。也都是在南方。此后各朝都有析置州郡情况。

唐代州郡还有置而废、废而复置等情况。

(3) 由于唐高祖采取以官招降的措施，“权置州郡”(《旧唐书·地理志一》)，匆促命名，产生了州名相同的现象。当时竟有四个义州，三个文州，二个丰州，……。为了避免混淆，武德、贞观年间，对相同的州名，进行了调整。有的改名；有的加上东、南、西、北的方位词，以示区别。

还有不少“文相类”、“声相近”的州名，容易搞错，也需要进行调整。例如：贞观八年改铜州为容州(《新唐书·地理志七上·岭南道》)，即因“铜”“同”声近。开元十三年(725)二月，改幽州为邠州，鄆州为莫州，梁州为褒州，沅州为巫州，舞州为鹤州，泉州为福州。即因“幽”类“幽”，“鄆”类“郑”，“梁”“凉”声近，“沅”“原”声近，“舞”“武”声近(《旧唐书·玄宗纪上》、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)。

此外，还有因嘉奖忠义、宣扬文治武功而改州名的。如西会州“贞观八年以足食故更名粟州”(《新唐书·地理志一·关内道》)。

(4) 唐朝前期因避讳而改州名者，史不绝书。唐朝后期的皇帝，如懿宗名漼，僖宗名儇，昭宗名晔，哀帝名柸，皆为冷僻之字，因避讳而改州名者遂少。

唐代州名，不仅因避讳而改，还有因仇视敌人而改者。如至德元载(756)，唐肃宗因恶安禄山而改带“安”字、“禄”字、“山”字的州郡之名。

武后改唐为周，从尊武抑李、崇周贬唐的政治需要出发，改州县名甚多。景云元年(710)睿宗诏：“天下州县名目，天授以来改为‘武’字者，并令复旧。”(《旧唐书·睿宗纪》)

天祐时，朱温(全忠)为篡唐作准备，以傀儡皇帝——唐哀帝的名义，下令避朱氏家讳而改州名。

(5) 唐代道与州的隶属关系及其变动情况，详见《新唐书》中的《方镇表》。

上述情况，是使用《唐刺史考》第一至十五编，特别是第十六编时所应注意的，也是可以从中得到印证的。

总起来说，玄宗以前，由于政治上、经济上的种种原因，唐朝的地方行政区划，尚未定型，州县的析置并省，变动频繁。玄宗以后，比较稳定些。《唐刺史考》以开元二十九年建置为准，是恰当的。

读者还可以从郁书中看到唐代地方官员设置和演变的某些细节。例如京兆府，唐初称雍州，长官称牧，往往由亲王兼任，唐太宗和他的儿子魏王泰都曾任雍州牧，其实他们并不管事，真正管事的实际长官称别驾。高宗时，别驾改称长史。玄宗时，雍州改为京兆府，长史改为京兆尹，由亲王遥领的雍州牧改称京兆牧。又如东都，唐初称洛阳宫，高宗显庆时改称东都，武后时改称神都，天宝年间又改称东京。其长官称留守。但初唐时的洛阳宫留守或东都(神都)留守，不是常设的官员，因为当时的皇帝常住在洛阳。只有当皇帝回长安时，才设东都(神都)留守。大约在睿宗以后，东都留守才成为常设的官员。又如唐代的节度使，不是一开始就兼任治所所在州的刺史。开元九年设朔方节度使，治所在灵武，尚未兼任灵州都督。天宝元年王忠嗣开始以朔方节度使兼任灵州都督，以后才成为定制。贤皓兄用汗水换来了这些成果，可以补充一般“隋唐五代史”专著之不及。

(三)

重视第一手材料，进行周密的考证，是《唐刺史考》的特色；原始性和可靠性，是《唐刺史考》的优点，举例说明如下：

(1) 正史、方志没有记载某人做过某州刺史，《唐刺史考》从石刻、金石书籍中考出。例如：上海图书馆所藏《并州太原县令李冲墓志》拓片称：“父弘节，皇朝任杭、庆、原三州刺史……，并州大都督府长史，雍州别驾，交、桂都督。”正史中无记载，《杭州刺史考》亦不著李弘节，郁书予以收录，并据《芒洛冢墓遗文四编·大唐故交州都督、上柱国、清平县公世子李道素墓志》，考出贞观十二年李弘节在桂州都督任，由此推知其任他州都督、刺史的约略年代。又如：《八琼室金石补正·开业寺碑阴》云：“建伽蓝主陕州刺史、司徒公李徽伯，息徐州刺史、北海郡子旦，息豪州刺史、兵部尚书子碓。”开耀二年(682)立。正史中无记载，郁书予以收录。又如：据《千唐志·杨宁墓志》考出杨宁约元和六、七年间(811、812)为郑州刺史，而《新唐书·杨虞卿传》未及，仅云父宁，“顺宗初，召为殿中侍御史，终国子祭酒”。

(2) 正史、方志虽记载某人做过某州刺史，但任职年月不详，《唐刺史考》从石刻、诗文等材料考出。例如：《旧唐书·刘政会传》说子刘玄意“高宗时为汝州刺史”，郁书据龙门石窟造象永徽元年(650)十月五日汝州刺史刘玄意题名，证知永徽初在任。又如：两《唐书·吕渭传》仅记其子吕让终官为太子右庶子，不详生平，《岳阳风土记》虽记载吕让曾为海州刺史，而不详任职年月，郁书据马戴《送吕郎中牧东海郡》诗，考出吕让约在开成、会昌中为此官。

(3) 唐人诗文中提到某州刺史，往往有姓无名，《唐刺史考》据各种资料，辗转考出。例如：《唐诗纪事》卷九“崔湜”门载《秦州薛都督挽词》，此诗，《全唐诗》卷五四崔湜名下、卷九六沈佺期名下互见。前人不知薛都督是谁。郁书据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三下》“薛氏”表，高宗时齐州、润州刺史薛宝积之侄“纯，秦州都督”，时代相合，证知《秦州薛都督挽词》之薛都督名纯。

《全唐文》卷二四〇载宋之问《为皇甫怀州让官表》，卷二四一载宋之问《送怀州皇甫使君序》，岑仲勉以为是《元和姓纂》卷五“安定朝那县皇甫氏”的皇甫恠，此人当过汾州刺史，但未有做怀州刺史的证据。郁书据《千唐志·监门卫长史皇甫慎墓志》（开元十九年卒）“父知常，汾、怀、汴等六州刺史”等语，与《为皇甫怀州让官表》“作镇西河，未宽人隐”语合，证知“皇甫怀州”名知常。皇甫知常任怀州刺史前，为汾州（西河）刺史。订正了岑说。《全唐文》卷八三五重出《为皇甫怀州让官表》，署名钱珣作。郁书指出，钱珣为唐末人，当为误收。

王维有《京兆尹张公德政碑》，赵殿成未注其名。《金石录》著录此碑，系于开元二十一年，未著其名。郁书据《长安志》卷九“安业坊”有京兆尹张去奢宅，《山右金石记》卷五《虞乡令张遵墓志铭》“祖去奢，银青光禄大夫、京兆尹”语，又据西安昭陵碑林的《张去奢墓志》称去奢曾为郢州、汾州刺史，与王维《碑》文中提到的“张公”历官相合。证知王维《碑》文和《金石录》中的“京兆尹张公”名去奢，并考知其开元十九年至二十年在京兆尹任。

岑参有《送任郎中出守明州》、《潼关镇国军句覆使院早春寄王同州》诗，闻一多《岑嘉州诗系年》、陈铁民等同志《岑参集校注》，均未注其名。郁书据《新唐书·安禄山传》考出岑诗之“任郎中”名瑗，至德二载至乾元元年为明州刺史。又据韩愈《唐故江南西道观

察使王仲舒神道碑铭》，证知王仲舒父政曾为鄂州刺史；据贾至《送于兵曹往江夏序》“冯翊太守王公移镇武昌”等语，考出岑诗之“王同州”名政。

仅从以上四例，已可看出《唐刺史考》对研究唐代文学作品的参考价值了。

(4) 正史、方志记载刺史的姓名错误，《唐刺史考》据姓氏书、石刻等资料予以纠正。例如：《新唐书·西域传上·党项传》提到同州刺史韦胜，郁书据《元和姓纂》卷二“东眷韦氏大雍州房”有“腾，同州刺史”，时代相合，又据天宝四载石刻《孝经序》题名有韦腾，证知《新唐书》之韦胜当为韦腾之误。又如：《淳熙三山志》卷二一“郡守”云“贞观四年，柳遯”，郁书据《千唐志·唐故处士河东柳侃墓志》“父遯，皇朝屯田、职方二郎中，散骑常侍，泉州刺史”，侃卒垂拱元年，年六十七；又据《芒洛冢墓遗文四编》卷三柳侃第三子《柳永锡墓志》，其祖名遯，官职与《柳侃志》所署同，柳遯当仕于贞观初，时代相当，唐初福州称泉州，断定《三山志》之“柳遯”乃“柳遯”之误。又如：《姑苏志》误孙成为“王成”，《严州图经》误阎敬受为“阎钦爱”，郁书均据有关资料予以订正。

(5) 正史、方志以及前人记载刺史的任职年月错误，《唐刺史考》据石刻、姓氏书、制诰、诗文予以纠正。例如：《旧唐书·宪宗纪下》说张正甫元和十二年(817)八月由同州刺史迁河南尹，然白居易有《张正甫可同州刺史制》，居易元和十五年(820)始知制诰，证知《旧唐书》之误。又如：《旧唐书·张昺传》说“乾符三年，出为华州刺史。其年冬，检校吏部尚书、鄂州刺史、天平军节度观察等使”。吴廷燮、岑仲勉仅指出张昺为天平军节度使当在乾符四年至六年，而未考出其卸华州刺史的年月。郁书据《全唐文》卷八四二许鼎《唐通和先生祖君墓志铭》“丁酉年，鄂侯杨公为华牧张公乞

丹于先生”语，证知丁酉年即乾符四年张昺尚在华州刺史任，《旧唐书》误。又如：《嘉定镇江志》载薛宝积“武德七年以后或贞观初”为润州刺史，郁书据《金石录》卷四有《唐齐州刺史薛宝积碑》，总章二年八月立，《山右金石记》卷十有《唐扬州长史薛宝积清德颂》，周长寿二年立，证知薛宝积为润州刺史当在高宗、武后时，《嘉定镇江志》误。

《唐才子传》卷六“姚合”条称姚合宝应中为杭州刺史，而卷八“郑巢”条称姚合大中间为杭州刺史。《杭州刺史考》云姚合宝历间为杭州刺史。岑仲勉《唐集质疑》认为姚合为杭州刺史应在大和六、七年间，又云“似在会昌时代”。郁书据姚合《送裴大夫赴亳州》诗，考知姚合乃裴弘泰之后任，又据刘禹锡《汝州举裴大夫自代状》，证知裴弘泰大和八年在杭州刺史任，断定姚合为杭州刺史在大和九年。解决了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，为唐代诗史的研究作出了贡献。

从现存的资料，要想把唐代各州刺史的姓名和任职年月全部考证出来，是不可能的。贤皓兄通过广泛的收集，细致的排比，辗转的考订，尽可能地把它钩稽出来，基本上再现了唐代刺史的巨幅图卷，为我们研究唐代地方行政提供了重要的线索。

(四)

中国知识分子有献身于学术的美德。举例来说，明末清初学者顾祖禹昼则教书，夜则撰述，历三十余年，写出名著《读史方輿纪要》，受到人们的景仰。

《唐刺史考》是贤皓兄在完成大学教学任务之外的业余著作。他利用业余时间，特别是寒、暑假，到图书馆查阅资料。或在清晨，